

在加强法制教育的同时,还应当广泛进行关于林济中所占重要地位的宣传教育。森林对于改造自然、发展、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在这些方面所起的效果就远超过其他;相反,乱砍乱伐人们就要遭到自然的惩罚。这不仅在中国,而且世界上各地群众也都有切身体会。人们认识了这些自然规律,爱护林木,发展林业,也可以更加有效地防止森林火灾。

现在,国务院颁发了《布告》,各地应该做出具体贯彻执行。对破坏森林的坏人,要严惩不贷;对玩忽支持破坏森林的工作人员,要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要同伙。要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一定要把《布告》落实好,做到家喻户晓,政策落实,保护森林,发展森林。

十、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加强对林业工作的领导，认真发动群众造林护林。凡所辖地区发生重大森林火灾和毁林案件，使森林资源遭受严重损失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对玩忽职守，纵容支持破坏森林的工作人员，要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办。

团中央国家林业总局发出通知
青少年要成为建设“绿色万里长城”突击队

春节期间全国大部地区降瑞雪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日电 今天，首都又降瑞雪。据中央气象台提供的材料，我国大部地区春节期间也降了雪。

由于冷空气的影响，一月二十七日到二日，我国从东北南部、西北东部直到华北北部的大片地区都先后降雪（有些地方先后雨雪）。

降水量一般有二到十毫米。其中，河南东部、湖北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有十到二十毫米。降水量大于四十五毫米的地方有：安徽阜阳、黄山，湖南长沙，江西南城。

去年入冬以来，全国大部地区降雪稀少，有些地区干旱严重。这次降雪，使北方冬麦区南部、长江中下游一些地区和广东、广西、福建三省、部分地区地区的旱情有缓和和有利于越冬作物的生长。但是，降水不均匀，不少地方雨雪还少，这些地区仍需继续开展抗旱和防旱工作。

他还说：“美国人民二百年来艰苦创业，实现了工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特别是你们称作阳光地带的南部地区，近三十年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你们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

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

参加晚宴的来宾有：美国能源部

在阵阵掌声中，伍德科克把中国客人们介绍给参加宴会的人，然后，亚特兰大市长梅纳德·施莱辛格说：“你们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

在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实行民主管理的制度

大庆油田坚持开好技术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郭玉德报道：大庆油田党委召开油田开发第十七次技术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石油部副部长、油田党委负责同志、地质师、工程师和工人代表。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洋溢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浓厚气氛。许多份报告和大多数人的发言，都有专题研究成果，尽可能地利用了室内试验、现场试验及油田生产动态的大量数据。尤其可喜的是，普遍运用了沉积相和渗流力学的理论，增强了解决问题的手段，加深了对中含水期油田稳产特点的认识。

大庆油田把开这样的技术座谈会，当作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实行民主管理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制度，长期坚持下来，其中只有两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中断。在这次会议上，油田科学设计院流体力室在规划油田高产稳产技术措施时，根据国内外有关资料，提出纯油区的井口注水压力要继续控制在二百三十个大气压左右，非纯油区的井口注水压力要继续控制在二百五十个大气压左右，否则，油层会出现裂缝，含水急剧上升，造成暴性水流，使油井减少产量。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采油四部的同志依据自己的实践，认为大庆油田井按照上述压力注水以后，纯油区还有大部分非主力油层没有吸水，油井中个别层段出现的水淹现象，不是由于提高注水压力的结果。他们主张纯油区井口注水压力要提到一百五十个大气压，才能保证注水采油的实际需要。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目前油田开发中一个重要的技术措施或技术政策。油田主管部门的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后一种意见，希望他们在实践中进行试验和争论，求得更新的认识。多少年来，对一些技术上有争论的问题，他们都不忙作结论，而是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就能鼓励大家独立思考，敢于提出问题。

在这次技术座谈会上，大家讨论通过了油田副总地质师唐曾熊作的《大庆油田高产稳产近三年来地下形势及今后七年稳产的分析 and 安排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经历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去年九月中旬以来，为总结油田高产稳产的经验 and 制订下一步稳产规划，广大采油工人开展了地下情况大调查活动。唐曾熊和一些技术干部深入基层，和工人们一道，从一口井，一个开发区块，一个采油队做起，分析研究地下情况，把分散的、局部的一些经验和问题集中起来，然后交给技术座谈会反复讨论，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形成总的技术方案。技术座谈会后，主管技术部门的同志再次下基层，和群众一起贯彻落实技术方案，发现问题，及时修正。经过半年的实践，对方案的有关内容又作了个别的修改。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就是在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领域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过程。这样，就减少了瞎指挥的现象。

在技术座谈会上，一些工人的发言，常常使技术人员开阔了思路。有一次，采油二部四十七队一个工人说，油层中有一条通往水的路，就象人身上的血脉一样，我们工人把它叫做“自然水路”。油田开发室副主任地质师王启民听了很受启发。他当时在进行主力油层开发的现场试验中，也碰到发展层的水“不听话”的问题。他两次专程拜访了这位工人，并且研究了流体力学的有关理论，综合分析了一百多口井油层中水的自然流向和注水后的变化，从沉积理论的新认识中解答了这个难题。他根据这个认识，调整了注采关系，取得了原油增产的明显效果。

这次技术座谈会召开以后，王启民正在搞油田老开发区第三套油层开发试验的方案设计。开始，他准备设计一种井距相同、井与非井之间距离较小的方案。后来，他同来自老开发区参加技术座谈会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座谈。他们提出对这套油层的井距要适当加大，注意跟老井衔接，便于今后综合调整改造。王启民吸收了他们的建议，设计了一种大小两种井距的试验方案。这种方案，可以相互进行比较，既能够早一点看到试验效果，又能看到将来打生产井时用地多大井距更为合适。在技术座谈会临近结束时，王启民的设计任务已经完成了。通过召开技术座谈会，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有力地推动科学技术研究，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童大林、熊彤和石山写的关于西北黄土高原建设方针问题的两篇文章，并建议科技工作者展开讨论。最近，国家林业总局邀请了林业科研等部门的学者和科研人员，就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问题进行了讨论。下面是本社记者根据座谈整理的摘要。

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

应以林牧为主

马奇编（林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我赞成童大林等同志提出的西北黄土高原建设以林牧为主的方针的建议。因为确定一个什么样的方针，要看解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和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自然环境早已遭到破坏，长期遭受无穷尽的生态性灾难。以牧为主，已是恶性循环，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彻底改变这一地区的现状，就应改变以农为主的方针，实行以林牧为主的方针。

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实行以林牧为主的方针后，能不能尽快改变这里的贫穷落后的面貌呢？我认为完全可能。以林业为例，在我国大面积成功的例子不止一个。

二十多年来，同样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生态性灾难地区——晋南阜平，已造林三百六十万亩，现在整个晋南变成了绿色海洋，不仅改变了自然环境，而且保障了农业增产。河南省黄河故道也是全国闻名的老灾区，由于大搞造林绿化，二十年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一变化的主要标志就是出现了园林化村。目前的发展趋势正由一村、一队、一社、一县向一个地区发展，村、社、队、乃至地区之间园林化正在形成有机联系，必将向更大的范围引伸。这一地面上的绿色连锁反应，今天是为“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基础，而明天必将为这里的人们创造出享之不尽的绿色源泉。

晋南阜平、黄河故道大力发展林业，可以改变面貌，西北黄土高原也应当是能够做到的。

以林牧为主也要因地制宜

宋朝枢（林业科学院森林植物研究室

主任）：童大林等同志提出的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我是赞同的。但在具体实施的时候，确要考虑因地制宜，切忌一刀切。黄土高原面积达二十七万平方公里，地形复杂。根据我和一些科技工作者对这里多年的调查，应按不同类型，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大区：

一、黄土塬地区。塬地主要有甘肃省的董志塬、旱胜塬、长武塬，陕西省的洛川塬等。这一地区的特点是塬面平坦，水土流失较轻。但塬地由于流水侵蚀，大部分已较深切分割，沟道面积逐渐扩大，如不加速治理，将来也会变成黄土丘陵。这一地区塬面实行以农为主，自给有余，林牧为辅，自给自足的方针。塬面营造农田防护林和塬边林带，实行草田轮作；沟谷则以林为主，待树木成林后，可作林牧放牧。

二、黄土丘陵区。这是黄土高原面积最大的一个地区，约占百分之六十五。由于自然界的长期侵蚀，造成许许多多的沟谷，沟谷面积占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形成黄土高原特有的梁、峁、坡、沟、壑的地貌类型。以陕西省为例，大致在富县以南侵蚀程度较轻，为高原沟壑区，富县以北水蚀严重地区，为丘陵沟壑区，也是全国水土流失严重地区。这里应以林牧为主，自给有余，农业为辅，自给自足。具体则在梁、峁顶部及坡的上部发展林业；梁、峁坡面下部修梯田，实行林带草带结合或农田轮作；在沟底应打坝淤地造良田，有的地区可实行果园或果条结合；河川地带治河造田，建成高产的基本农田。但在治理时，必须参照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大队和山西省河曲县曲峪大队那样，采取综合治理、集中整治、连续治理、坡沟兼治、生物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实行“三三制”，退耕还林，退耕还牧。如果仅在沟川打坝造田，不治坡面，结果坝被冲垮、良田被冲毁、水库变泥库，这样的经验教训不少。群众

为什么国营厂装配门锁的效率不如街道生产组？

上海长征锁厂生产的丰收牌弹子门锁，在去年七月全国同行业质量评比会上被评为第一。因此，厂党支部办公室挂着一面大锦旗，绣着“全国弹子门锁质量评比流动红旗第一名”十七个大字。

但是，这种门锁绝大部分是包给武夷街道一个生产组做的，工厂自己只承担一小部分。令人吃惊的是，同样装配门锁，效率大不相同，国营厂反而不如小小的街道生产组。

武夷街道这个生产组有四十九名生产人员，平均每人每天装四百六十把锁，最高的超过五百把。长征锁厂装配门锁的一个小组有十三名工人，平均每人一天只装配二百八十把，还不到一九七一年的水平。

武夷街道那个生产组的全部成员都是体弱的家庭妇女和知识青年；而长征锁厂那个小组的工人，平均比街道生产组成员年轻七岁，技术水平和健康状况都比较好，生产场地和设备条件更是好得多。

过去向街道生产组讨

授装锁技术的锁厂工人，现在平均每人日产量只有徒弟的百分之七十，这是什么缘故？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访了长征锁厂厂长常家坤。他对这深有感触，他认为主要是“吃大锅饭”的思想在作怪。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常家坤的话确是击中要害。街道工业是集体所有制，实行生产小组独立核算，街道自负盈亏。职工是计日报酬，干一天拿一天的工资。生产任务完成的好坏，企业收入多少，与个人收入密切相关。武夷街道那个生产组，自从一九七一年成立以

来，由于生产发展，积累增加，福利待遇有了很大改善。因此，大家都很关心自己的集体，千方百计地把生产组办好，出勤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上班八小时，人人争分夺秒地干。几年来，这个组的产量、质量直线上升，定额指标一再提高。

长征锁厂的那个装锁小组却是另一番景象。有人的干活慢慢吞吞，有的人干边干聊天，有的人干脆放下工作找人闲聊。据说，厂里从一九七一年就开始实行定额制度。但是，过去由于没有奖励办法，

不光是当“意见箱”，群众正面反面的意见都能听得进去，还要做“加工厂”，采纳群众正确的意见，纠正错误，改进工作。这是中共江苏江都县委在发扬民主作风中的一点切身体会。

一九七八年四月，在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时，县委书记章昌祥只听了个别同志的建议，没有经过试验，就要各地推广“条播粮播”的秧块方法。这种种方法工费贵，一亩要几十个人工，群众很有意见。许多队干部和社员纷纷向章昌祥和县委其他领导成员提出批评，说这样做要耽误季节，推迟栽插，造成减产。刚听到这些刺耳的话时，章昌祥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他转念一想，群众批评“顶头上司”是很不容易的，是出自对农业生产的责任感，应该认真对待。他立即到黄恩、周西、宗村等公社作调查，并在蹲点的小组公社纪东大队和社员们一起研究，这才认识到大面积极“条播粮播”确实有困难。

他回来后，立即召开电话会议作了自我批评，收回了这个不切实际的要求。

再一件事对县委的教育也很大。有个公社在一段时间内，片面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砍掉桑树，改种粮食。结果粮食产量虽然上去了，但副业产值下降了，社员收入降低了。可是县委有的领导成员只看到这个公社粮食产量高，很赞赏这种做法，便大会宣传、小会表扬，又授红旗，又发奖状。其他公社的干部、社员气愤地给县委提意见说：毁桑种粮，还得到表扬，这要把我们引到哪条路上去？县委成员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打算公开向群众检讨，纠正种植方针上存在的偏向。但县属部门有的

干部说，这样做会削弱县委的威信，今后说话就没人听了，不如地一抛，个别做工作，悄悄改正算了。到底怎么办？县委讨论后认为，群众的批评中要害，县委遮遮掩掩不行，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坚决改正。于是，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常委会上和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公开作了检讨，并以实际行动纠正了光抓粮不抓多种经营的片面做法。

一九七八年对夏熟高产单位授奖时，县委不再把粮食产量作为授奖的惟一标准，而是要求做到“大、全、多”，即粮食增产幅度大，农副工项目发展全，社员增加收入多。社员们说：“这样指挥生产，我们有奔头。”

江都县委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勇于改正错误，广开了言路，活跃了民主生活，密切了干群关系，敢讲话、肯提意见的人多了。现在，县委负责同志下乡，一大群人涌上来围成一堆，就拉起了“知心话”。一九七八年春天，队干部和饲养员从母猪繁殖到饲料生产，从人员落实到奖励制度，向县委提了几百条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县委制定了发展养猪的八条规定。去年一月到十月，全县各地干部、群众向县委写了三千多封来信，反映落实政策、干部作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柴米油盐等方面的问题。县委负责同志对其中的一四百多封作了批示，做到件件有着落。

江都县委的同志感到，有广大群众做耳目，走起路来脚步更稳了，抓起工作来方向更明了。

新华社通讯员 倪玉泉

既当“意见箱”又做“加工厂”——记江都县委发扬民主作风的二三事

干部说，这样做会削弱县委的威信，今后说话就没人听了，不如地一抛，个别做工作，悄悄改正算了。到底怎么办？县委讨论后认为，群众的批评中要害，县委遮遮掩掩不行，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坚决改正。于是，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常委会上和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公开作了检讨，并以实际行动纠正了光抓粮不抓多种经营的片面做法。

一九七八年对夏熟高产单位授奖时，县委不再把粮食产量作为授奖的惟一标准，而是要求做到“大、全、多”，即粮食增产幅度大，农副工项目发展全，社员增加收入多。社员们说：“这样指挥生产，我们有奔头。”

江都县委的同志感到，有广大群众做耳目，走起路来脚步更稳了，抓起工作来方向更明了。

新华社通讯员 倪玉泉

怎样把西北黄土高原建设好？

——部分林业科研人员座谈纪要

以牧为主的方针不宜采用

刘家声（国家林业总局造林局工程师）：为了改变黄河中游地区落后面貌，中国科学院兰州同志提出以牧为主，兴畜促农、农林牧全面发展的方针。我个人认为以牧为主的方针不宜采用。这里提出来，与石山同志商榷。因为这样一个失去发展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地区，干旱而又水土流失严重，种植牧草也不见得到可以长起来的，即使能成活，产草量不会很高。更重要的是只有靠发展林业，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完全控制水土流失。据科学测定，这一地区森林植被率要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以后，才谈得上种草，大力发展畜牧业。

我的看法是：在这个地区结合林业和农业的发展，因地制宜，适当种牲畜，发展一些以圈养为主的牛羊等牲畜是可以的，也是完全应该的。发展得过多了，一则饲料不易跟上，二则改良细毛羊能否适应这个地区山高、坡陡的环境，还有待研究。实践证明，当地山羊不能多发展，它破坏植被，促使水土流失，经济价值也不高。

建议尽快成立机构加强领导

刘广运（国家林业总局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范济洲（原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改变黄土高原的面貌，确定正确的治理方针是十分重要的，科研单位要当好参谋，但决定权在党政领导手里。建议国家成立专门领导机构，迅速抓起来。不要议而不决，讲而不行。以成立西北林业研究所为例，讲了七、八年也成立不起来，老议而不决怎么办呢？

在这里，我们认为应该重视当地农林科技人员的作用。他们有一定的科技知识，又熟悉当地的自然情况，在改造黄土高原的事业中，是一支很可贵的力量。但当前许多科技人员不能专心致志地从事本职工作，这是对人材的很大浪费。应当向各级领导呼吁，尽快改变这一部分同志的处境。另外，西北许多农业院校增设相应的专业，积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新华社）

粮食和水的问题很值得考虑

程崇德（国家林业总局造林局副局长工程师）：我认为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粮，二是水。不管生产方针确定以什么为主，首先都要解决吃饭问题，与此相关联的是人口增殖问题。目前多数地区口粮和生活水平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了。要改善这种状况，既不能全靠进口粮食，也不能实行移民，只有下力量改变广种薄收，使吃饭有保证，同时可以把退耕腾出来的土地，发展林业与牧业。这就要有一定时期的过渡时期，即休养生息。在这段时期内，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进行调查，实事求是地是一个一个队的确定口粮标准，应该减免农业税的就减免农业税，应该不卖余粮的不卖余粮，应该调进粮食的就调进粮食。国家在资金、水利、机械、化肥、良种、技术等方面应该扶持的，就积极扶持，还要严格控制人口增殖。

其次是水的问题。这一地区全年降雨量不多，且又集中在夏季，往往是无雨旱灾，有雨涝灾。目前灌溉条件很差，多数地区不宜打井、不宜开渠，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指望靠南水北调，所以当前除了要搞好水土保持以外，如何提高生产用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很值得考虑。

宜什么搞什么，水土保持是关键

杨含照（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要在搞好水土保持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如果水土冲刷不停下来，什么都是空话。不仅农田要注意水土保持，林地草场也有个水土保持问题，不是说种了林草就万事大吉了。要知

随着陶铸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受的冤抑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一名誉，他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也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了。我把全书再次细读了一遍，感到它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仍然是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和实事求是风格教育的好书。陶铸同志热爱林彪、“四人帮”迫害，已经不在人间，但是为人民解放事业鞠躬尽瘁在这位前革命家、革命战士所怀念。这本书是他留下的宝贵的革命遗产之一，是应该向还没有读过它的读者推荐的。

文化大革命中陶铸同志的遭遇怎样，内部始末如何，我知道得很少，因此，这篇文章是不打算也不可能谈这一些事情的；他的女儿陶斯亮同志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已充分说明了这一切。我这篇读后记，不过是就书论书，因事论事，最多涉及我对陶铸同志的一些印象罢了。

广州解放初期，叶剑英同志负责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工作的时候，陶铸同志担任他的秘书。那时我们这些南方干部都还不认识他。某日，在一次集会上，一个留着浓胡子的老头儿登台演讲，对于事物分析的深刻锐利和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感情很快就吸引了我，使我从内心深处感到折服。事后一打听，这人就是陶铸同志。这之后不久，他把胡子全刮了，年龄仿佛轻了许多，像个中年人了。但是每次听他演讲，那种热情洋溢和鞭辟入里的言辞给我的印象仍然和第一次听到的一样。在多次的接触当中，我观察到，群众对他们是十分敬爱。他和群众在一起的时候，态度也很平易近人（在作报告，批判严重不良现象的时候，那又是非常蛮横泼辣的）。一九五九年，我在韩江流域一个农村参加劳动。陶铸同志率领省委一些同志前来视察，把我从田野里叫了回来，问这问那。午餐时，那个大队设了些儿丰盛，但也不算浪费的饭菜欢迎他们，其中有一样菜是番薯蘸白糖。陶铸同志笑着说：“番薯蘸白糖？这恐怕不是农民吃的菜，是地主的吃法。”他又要大管家算一笔，办这么一顿饭菜招待省里来的一批人，这个大队每一个农民要负担多少。接着，又穿着鞋挂在村头村尾到处跑，到处问，这事情也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是律已颇严的。

以后，我在《羊城晚报》工作的时候，和陶铸同志接近的机会更加多了一些，为了改进编辑，党委委员们常常被召集到一起开会。陶铸同志抓工作抓得异常之紧，会议常常开到深夜；有时把许多报纸铺在地下，他就蹲在地上对照着来看，边看边记。我觉得，陶铸同志是相当重视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对其中的一句有意见，直率地提出要修改，他考虑后完全按照大家提的改了。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做报告时，常常讲到希望自己一生的努力，能够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就好了，死后能够真正有资格在墓碑上题上“共产党员陶铸之墓”就好了。若干年后的今天，这些话竟成了谶语。在书里《高度发扬革命的自豪感》一文中，陶铸同志写过这样的话：“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很有意思。那么我们究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还是‘普通材料’，甚至是‘假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呢？在严重的斗争考验中，在炽热的熔炉中，是钢铁坚强，自然立即分化脱。这段话，经过了浓雾漫天、风雨飘摇的那些日子以后，读起来格外令人感到新鲜和震动。当我们党的工作着重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切从前如坠五里雾中的人物和事件逐渐呈现出他们清晰轮廓的时候，陶铸同志终于得到了历史公正的评价，我们读他的书，对照这段话来看，是别有一番深长感受的。

所以我写下这些事情，是想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这本书。因为此书，也相当深刻地显示了他的个

一份宝贵的革命遗产

——重读陶铸同志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

秦牧

性。这本《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是陶铸同志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七、八年间，一些谈论思想、修养的文章的汇编，它们一共十篇。六十年代初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受到广大青年热烈的欢迎，在短期间内，就印刷了二十六次，发行一百五十万册。现在，它重版出书，意义不但丝毫不减当年，而且更增添了重量，因为陶铸同志的刚正不阿、凛然正气为林彪、“四人帮”所不容，受迫害致死，这就使这本论述共产主义品德的书更加焕发光辉。再说，“四人帮”横行十年，对老一辈革命家固然是肆意迫害，而对年轻一代的败坏，不仅在范围、规模方面更加广泛。此辈人面东西，惯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施展两面三刀手法，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就在广大青年当中造成了一批批混淆愚昧的分子、刑事犯罪分子，以及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分子。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什么叫做共产主义理想？什么叫做社会主义公德？对这方面的道理，真是“山在虚无缥缈间”。但是他们不是茫然不知，就是在偶尔听到几句的时候，凭着他们的一知半解，立刻在嘴角挂上一丝青年般假但实际是市俗主义者的微笑，摇头了事，表示自己早就“看破红尘”，不再理会这一套了。自然，当年残酷的现实也从反面教育了大批青年革命战士，因此而有轰烈烈的“四五运动”。但是，前一种人物相当地量的存在仍是有目共睹的。打倒“四人帮”之后，情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革命的青年更加迅速在进步，

不待说了，不革命的，怀疑革命的，以至当过流氓阿飞的青年在新形势的教育下，也有不少人渴望汲取新知，改造自己。广大读者对于青年修养读物需求的殷切情况是异常感人的。常常有些作者，就发表几百封来文；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一篇这样的稿件，青年听众在深夜里就从四面八方，也从边疆海岸上迫不及待地写信向作者表示共鸣和感谢。在当前情况下，陶铸同志这本《理想，情操，精神生活》重版出书，将在广大青年读者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应，并将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必然的事。

陶铸同志在本书中的各篇文字，主要就是写给青年人看的、或者对青年人講演后整理出来的作品。他曾经大声疾呼：“不仅党、青年团要关心青年，而且全社会都应该关心青年，要在各方面造成关心青年、热爱青年的空气。”“我们要把各阶层的各

方面的青年都当作是关心、爱护、培养的对象”。写这本书，就是他在这方面的重要实践之一。他谆谆教导青年人应该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情操，具有充实丰富的革命的精神生活。他不断阐明，要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努力学习和实践，树立高度的集体主义思想，树立强烈的劳动观点，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我们要使青年养成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科学和爱护公共财产的良好思想品质；要使青年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一定要最后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剥削剥削吃饭是可耻的，大家共同劳动来过美好幸福的生活才是我们新社会的唯一出路。”这些语言是响着共产主义的强音的。

读这本书，有一种“娓娓道来，中肯动人”的感受，原因就在于它既有很高的思想性，又有强烈的感情，丰富的材料，而且，文采灿烂，相当生动活泼。例如其中《松树的风格》一篇，曾经多次被选入学校语文教材和全国散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要出版的建国三十周年散文选也把它选进去了。

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向往，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深厚感情，对人民的热爱，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使本书的许多语言喷射着火花，因而也就给人一种强烈的感受。

全书贯穿着一种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

神，这就使得它既切合实际，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例

介绍高士其的《你们知道我是谁？》

红耘

功能……。总之，作者用文艺手法向我们展示的，是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的丰富内容，是客观世界矛盾统一后的辩证规律。

高士其同志在作品中，恰当地把政治与科学、科学性与战斗性结合起来了。如一九四六年发表的《天的进行曲》一文，作者在介绍太阳、地球的有关知识和运行进化规律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有力地批判了中外古今的封建迷信思想，鞭撻了敢于上帝创造一切、主宰一切的谬论邪说，和摧残科学事业的欧洲黑暗的教学势力；同时，又热情地歌颂恩格斯和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所作的科学预见，讴歌了敢于同反动、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哥白尼、康德、爱因斯坦等科学界的前驱，最后并高喊出“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样宏亮有力的声音！在《让科学技术为祖国贡献才华》一文中，他声讨了“四人帮”摧残科学技术的罪行，歌颂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和大搞四个现代化的英明决策。

使我们高兴的是，在高士其

的各种矿藏开发出来；所有这些，光喊几句口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依靠现代的高度文化科学技术来彻底改造与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些话分别说于二十年前左右，而今天看来，却象新打宝剑，熠熠射出它的光辉。这就可见，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家，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从事平事造言论文字处处可以示人以本意，总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曾经对陶铸同志的这些作品横加污蔑，说什么这书宣扬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理想’”“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姚文元所运用的手法无非是歪曲割裂、造谣中伤。这套花招在这个无耻文痞看来，是他平白扣帽子打棍子的起家绝招和得意之作，其实不过是一套流氓本领罢了。在纸笔们看来，其理象是一团泥巴，可以任由他们随意捏来捏去，改变形状。但是历史无情，这些荒唐臆测践踏现实，涂改历史的小丑终于被抛到历史垃圾堆去了。陶铸同志这本书重版发行，也是对于万恶的“四人帮”的又一有力批判。

读这本书，我不禁想起了陶铸同志的音容笑貌，重温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听他演讲时的深刻印象。掩卷凝神，寄慨遥深。我写下这些，既表达自己对这个前革命家的怀念和哀思，也向广大青年读者推荐这本好书，这是陶铸同志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革命遗产。这里面，也显示了作者松树般的风格。

充分体会到生气勃勃的青春和生命的力量。此外，《天的进行曲》、《我们的土壤妈妈》、《生命进行曲》、《雄鹰》、《猪笼草和紫胶虫》、《空气》等篇，都是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我们从既能吸取到科学知识的营养和具体的教益，又能激起一种探寻宇宙和自然界各种奥秘的浓厚的兴趣。

高士其同志是科学家，是诗人，也是战士。从三十年代起，他就站在人民一边，向人民的敌人宣战。到了七十年代，高士其同志对万恶的“四人帮”也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在一九五七年四届八人会议期间，在敬爱的周总理接见时，他通过秘书给周总理送上一张字条：“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学习，请给予关心和主持。”这字条，实际上是对于“四人帮”破坏科普工作的愤怒抗议和严厉声讨。

高士其同志是在身体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写作的。《你们知道我是谁？》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高士其同志用自己整个青春和生命写成的书，是他用心血浇灌的科普文艺之花。

请为我们打开闸门吧！

晓风同志致陈荒煤同志的信

荒煤同志：您好！

目前，全国各地的文艺刊物都已恢复，中央和地方报纸也都有一个副刊。但是，翻一下报刊，见到的常是几个名字——“名人”。新人刘心武同志写作了《班主任》、《爱情的位置》等作品，确实是创作上的一个新突破，使我们高兴。但这样的新人，太少了，出来得太慢了。

我们尊敬那些对革命有贡献的著名作家，他们是文艺界的老前辈。他们中大都热心培养新生力量。可是，我们的编辑同志就不是这样。他们重“名”而不重“文”，不是择优录取，而是择名录取。

我们如今拥有的“名人”，都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老笔杆。他们当初动笔写刊物、辟阵地、出杰作的时候，大都是二十岁上下的热血青年。我们如今正当当年，我们也经过时代的洗礼，我们为什么不能干？而且我以为，写今天，尤其是写近十年，我们青年人更有所长。文艺前辈们十年中大都受到各种迫害，被隔绝于世，所体验的是特定的生活。而我们，由于我们的年青和无名，得以在社会动荡中冲杀沉浮，与最广大的基层群众共呼吸，共哀乐。

这十年，是非写不可的。不写不能加速时代的步伐，不能促进全民族的提高。无产阶级不写这十年，资产阶级迟早也会按照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需要来写这十年。不重视写这十年，无益于无产阶级，只有益于“四人帮”。我们也不能等。一边认识一边做，一边争论一边提高。我们青年应

该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我们年轻，不怕摔跟头，我们无名，没有负担。

文艺应该协助人民去总结、清算。老满足于肤浅的结论，国家和民族就不能刷新自己的历史。可是，我们的编辑同志却缺乏革命的气魄。外界的风霜已使他们丧失了革命的锐气。当然，我们已知编辑在内心里和我们一样，很希望祖国的文苑百花烂漫。但十年来，他们有许多难言的苦衷，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是“受夹板气”，稿子要从他们手里通过发出，如果有问题，他们也不罪责难逃。这些编辑，不是没有思想，而是没有胆量。要解放文艺，编辑的思想也要解放。

我们都这样体会：当作品快完成时，不禁忧从中来，愁上眉尖。到哪里去投稿？谁来对我们的稿件？我们最大的难处是指导发表、出版的机会很少，也难得得到指导和提高。冷遇和无理的批评使你处于孤独的探索之中。也许我们中的某个人会遇见一个“伯乐”，或找到一个“关系”，可是整个文艺界按此章程办下去，恐怕终难改变大局。

荒煤同志，我向您和文艺界的前辈们呼吁，为我们这样的无名青年，为业余作者开辟新的文学刊物，开辟新的阵地，以鼓舞士气；给各地刊物作出榜样，打破报刊、出版界重名不重人的倾向，把重视、关心、培养和发展文学新生力量的问题，一一付诸解决。这样的时机已经成熟。

请为我们青年打开闸门吧！我们已经急不可耐了。

晓风

陈荒煤同志致本报的信

编辑同志：

经过反复思考，我终于把晓风同志的来信封给同志们。

这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与其说是向我和文艺界发出的呼吁，还不如说是向人民发出的呼吁。表面看来，不过是一个青年文艺爱好者对我们的文艺现状不满，对我们一些报刊的编辑工作提出一些批评。实质上，“请为我们青年打开闸门吧”这个呼吁，涉及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报刊编辑部门、出版部门、甚至党的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好好思考。

我认为，晓风同志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一、他要求文艺更广泛地更深刻地反映人民林彪、“四人帮”的生死搏斗，写这十年的斗争，总结历史经验。

他认为：“这十年是非写不可的。不写不能加速时代的步伐，不能促进全民族的提高。”还特别指出：“老满足于肤浅的结论，国家和民族就不能刷新自己的历史。”这话讲得多好啊。

仅仅对照一下我们文艺界的某些同志为第一篇《伤痕》的出现就忧心忡忡、顾虑重重的现象，就说明我们对写这十年这个历史任务，还认识不够。广大青年“已经急不可耐”，要写或正在写，而我们如何去领导、引导，给予更多更有有效的帮助，远远落后于形势。各个有关领导部门怎么把这个工作领导起来，是很值得思索和研究的问题。

二、晓风同志对报刊编辑同志的批评，有对的部分，但我认为也有过分的地方。“心有余悸”的关键，并不在于只是提“名人”而忽视新生力量，还在于领导上不致坚决贯彻“双百”方针，不敢执行百花齐放的政策，而是实行百花齐“防”的方针，使得编辑人员怕“罪责难逃”，不能解放思想。

但报刊编辑部门如何实行艺术民主，如何坚决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如何积极发现、培养新生力量，也确实应该很好地总结经验，采取有效措施才好。

三、我国是一个八亿多人口的大国家，建国近三十年，由于教育的普及，青年知识分子愈来愈多，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他们确实是“思考的一代”、“战斗的一代”。因而，一方面，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愈来愈高，另一方面，不满足文艺的现状，想拿起笔来自己创作、讲讲心里话，发表自己见解的人也就愈来愈多。这是非常好的形势。怎样给广大青年开辟创作的园地，让他们自己掌握命运，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开拓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文坛，难道不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应该积极予以支持的大事么？

我觉得所有党报都可以考虑办一个青年创作园地的副刊。例如，人民日报除《战地》外，还可来个《青年园地》，或者把《战地》扩充一倍至二倍，多刊登青年的创作。过去人民日报不是每天都有副刊么？

在解放前，不论什么政治派别甚至商业性的报纸也都有个“报纸副刊”。许多现在知名的作家，当初就是在这些“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的小青年。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的报纸就不能开辟这么个小小的园地，给青年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战地》？

我建议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出版社考虑办一个《中国青年文艺》的杂志。由青年们来主办，发表青年的作品。并每年举办青年文艺评奖，奖励青年的作品。

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与各地作协恢复过去举办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学习、座谈、讨论会，甚至举办一年左右的讲习会，积极开展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

各地文艺刊物也应开展工厂、农村文艺通讯员的工作，加强对青年文艺作品的评论工作。

总之，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文艺创作队伍确实太少了，需要积极培养。希望党的宣传部门加强这方面工作的领导。

关于晓风同志对老作家的一些看法，我基本上同意，我想文艺界前辈也会同意。其实，我们这些“老人”，经常也谈到“接班人”的问题，不是怕“后继无人”，而是感到后继者太少，起来太晚。

至于说老作家这十年“大都受到各种迫害，被隔绝于世，所体验的是特定的生活。”这是实情。我们也确实没有能“在社会动荡中冲杀沉浮，与最广大的基层群众共呼吸，共哀乐。”但是这种特定的生活体验，我觉得并不会比“冲杀”的青年们得到的东西少。说实话，现在也有老年的“思考的一代”、“战斗的一代”。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长期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也在重新思考、重新投入战斗。他们思考的问题，他们战斗的目标，是和青年们一致的。然而思考的深度与广度，由于他们过去战斗的经历，加上“特定的”体验，恐怕较之某些青年还要深广一些。

我坚信，许多老作家在不久的将来会拿出更多更好的反映这十年和四个现代化的作品来和青年们竞赛的。

我也热诚地向你们建议，发表晓风同志的来信，以引起有关方面的关心和支持。

陈荒煤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日电 本社记者徐民和报道：诗歌，要和人民的脉搏、人民的脚步一起跳动——请写我们四个现代化伟大进程的雄壮进行曲；诗人，要和人民一道去思考、去奋斗——唱出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时代最强音。这是在北京最近举行的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上，诗人们所发出的共同心声。

由《诗刊》社召集的这次诗歌创作座谈会，是近三十年来新中国诗歌界一次空前的盛会。出席座谈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诗人和民间、民族歌手一百多人。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在会上讲了话。会议期间，王震同志和诗人们亲切见面，勉励大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热情和智慧。在座谈会上讲话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中国文联副主席席扬。在大会上发言和书面发言的诗人和业余诗歌作者、收集者，有冯至、臧克家、徐迟、李先群、贺敬之、赵朴初、艾青、白桦、姜秀珍、雁、晓雪、韦丘、景晓东、韩瀚、刘章、孙友田、徐刚、孙静轩、金近、李舟生、朱子青、克里木·霍加巴·布林贝赫、鲁歌、苗得雨、田间、公刘、叶文福、梁上泉、丁力、李瑛、张志民、公木、芦芒、宁宇、肖刚、李季、王震同志等同志。《诗刊》主编严阵，副主编郭帆、阿岩主持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是在党的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出席座谈会的同志们认为，在这个伟大的转折中，诗人的神圣职责就是要为我们四个现代化伟大进军献上光辉的诗篇。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人民也就要求精神产品的日益丰富。物质生产的劳动者为精神生产的劳动者提供丰富的原料，精神生产的劳动者给物质生产的劳动者以鼓舞、以信心，以崇高的精神境界。我们这两类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是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

包括诗歌创作在内的精神产品的生产，有它自己的独特规律。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应领导这种精神生产的正确方针，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座谈会回顾了近三十年的历史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什么时候执行得好，成绩就大，什么时候执行得不好，我们就要吃苦头。林彪、“四人帮”肆意践踏“双百”方针，是摧残我们整个民族科学文化的罪魁祸首。他们是人民的敌人。在我们党内，有些领导人也不懂得或不善于领导精神生产，搞过瞎指挥。但是，出席座谈会的同志们相信：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一定会学会善于领导精神生产的，他们会迎来诗歌的春天。

“双百”方针是社会主义民主在科学文化战线上的体现。座谈会就政治民主和艺术民主进行了极为热烈的讨论。座谈会回顾了我们的历史和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实践，认为，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三大大山，粉碎了林彪、“四人帮”，所有这些说明，我们党是有民主的传统的。无可否认，我们党内出现过林彪、“四人帮”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是摧残社会主义民主，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我们党内也有些同志进城以后当了“官”，不讲民主了，他们搞“一言堂”，损害了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天，固然还要继续肃清前些年留下的无政府主义的余毒，但是，缺乏民主是我们的主要的倾向。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以很大的力量、很大的决心来提倡恢复和发展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这是广大人民所看到的。与会者充满信心地相信，我们党是能够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的。大家认为，我们党是讲民主的，这是我们讨论民主问题时必须忘记的基本前提。忘记了这个基本前提，我们的头脑就会不清醒。我们要维护我们党的民主的旗帜。我们党的民主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学说。我们的民主是人民民主，而不是个人民主。在中国的这块大地上，是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们的宪法所规定的。我们的民主、自由不是离开我们的宪法去讲民主、自由，不是离开人民的整体利益去讲个人的民主、自由。我们的作家、诗人要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学说，教育人民去为健康地发扬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巩固和发展我国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保障四个

解放思想 加快速度

本报评论员

今年，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来，我们各项工作的步伐，都要大大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也必须抓紧进行，不能犹犹豫豫，久拖不决。把过去不应划为右派而错划了的同志，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是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人的积极因素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时间不等人，今天可以办好的事，决不要拖到明天，更不能让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再遭下去。

许多地区和部门，对这项工作抓得紧的，响，也有一些地区和部门，“只知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拖拖拉拉，行动迟缓，有的单位到目前为止，连一件错案也没有改正。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怕”字在作怪。怕什么？怕将来被戴上“右倾”、“为右派翻案”的帽子；怕“善门”难开，引起连锁反应；怕年代久远，不易查证，“自找麻烦”；怕否定自己，面子难看，下不了台；怕步子快了，又出差错，陷于被动。因此，他们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不成文的方针：宁迟勿早，宁少勿多。个别地方甚至想划到什么半截，最后不了了之。这种精神状况，与中央提出的“希各级党委会认真负责，切实做好这项工作”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与当前各项工作加快速度的形势是不相符合的。

改正右派错案是“右倾”、“为右派翻案”吗？不是。把过去做错了的事坚决改正过来，这正是忠于实事求是原则、具有革命胆识的表现；正是体现了共产党人对革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如果在大非面前，不尊重事实，不坚持原则，知错不改，将错就错，那才是机会主义的态度！至于说翻案，如果说错划右派的案件，就是应当翻，不翻不能正确评定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能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就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

是“善门难开”吗？不是。所谓“善门”，应该理解为为人民、为革命做好事。为人民伸张正义，主持公道，为长期受屈的同志解除苦闷，恢复政治名誉，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当去做呢？应当是有多少做多少，善门能开多大就开多大，根本不需要怕什么连锁反应。

是“自找麻烦”吗？是的。革命工作本来就是个“麻烦”的事，改正过去工作中的偏差和错误，的确是麻烦事。正因为有麻烦，有困难，才需要我们这些党员、干部去做工作。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再麻烦的事也应当去做，而且应当满腔热情、积极主动地去做。我们应当想一想，那些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二十年来曾碰到多少麻烦。时至今日，难道能因为我们工作中有因就撒手不管，或采取消极态度吗？

是“否定自己”吗？不对。共产党人襟怀坦白，大公无私，为了革命利益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如果过去错划右派确实与自己有关，那么，否定过去工作中的差错，主动进行改正，这是完全符合党性原则的，怎么能否定自己呢！过去也不允许错被错划为右派，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不应该，也不允许追究个人的责任。现在知道了错，就应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知错不改，一错再错，那就很不得人心，那才会否定自己。

总之，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定要解放思想，突破长期以来在落实政策工作中人为地设置的种种禁区，亲自动手，加强领导，具体帮助所属单位把这项工作认真抓起来，如果必须抓紧抓好。光说空话，不解决具体问题，是不能取信于人的，反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困难是有，但主要的还是思想解放不解放，对党中央的这一重要政策的态度对不对。中央有规定，不少地方和单位已经做出了样子，有什么可怕的呢？只要发扬共产党人应有的求实精神，思想明确，态度端正，方法对头，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是会有办法克服的，改正右派错案的速度一定会加快。

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谱写雄壮的进行曲

——《诗刊》召集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

现代化的胜利实现而奋斗。

诗歌是一种极为敏感的艺术，没有民主的空气和土壤，是不可能茁壮地生长的。座谈会认为，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扬艺术民主。艺术民主的前提是政治民主，在诗歌的思想内容上，要允许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发表自己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观点。诗人的政治思想观点向谁负责？向党和人民负责——党和人民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政治生活不正常，例如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就是要直接向人民负责。尽管这有风险，但我们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在诗歌的题材方面，我们有无比广阔的天地。因为我们人民的生活是无比广阔的，我们人民的事业是无比广的，我们人民的精神境界是无比广的。我们不能限制诗人只能写这种题材，不能写那种题材。诗人、作家可以到一切领域的生活中去，到一切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去。在诗歌的形式方面，我们要提倡万紫千红，允许各种形式的自由竞赛。对不同的形式，要允许作者和读者有偏爱，但是决不允许偏废。决不允许只许某种形式的存在，不许某种形式的存在。

座谈会讨论了文艺作品的审查问题。大家说，林彪、“四人帮”的审查，判决了许多作品的死刑，但是，人民要审查审查者，判决判决者。林彪、“四人帮”打倒了，许多作品不是照样又复活了吗？我们人民内部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审查，不能动不动就“拿枪审查——‘枪毙’”、“拿刀审查——砍掉”。文艺作品的好坏、优劣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好坏、优劣，不是以个人的意志、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爱心、好恶为转移的。讲审查，我们就要提倡党内行加群议，要实行评议、评奖的办法。

围绕着诗歌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个中心问题，座谈会回顾了新诗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探讨了诗歌创作的发展。大家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是有成绩的，五、四以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新诗都有过大大发展。“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是

现代化的胜利实现而奋斗。

座谈会讨论了文艺作品的审查问题。大家说，林彪、“四人帮”的审查，判决了许多作品的死刑，但是，人民要审查审查者，判决判决者。林彪、“四人帮”打倒了，许多作品不是照样又复活了吗？我们人民内部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审查，不能动不动就“拿枪审查——‘枪毙’”、“拿刀审查——砍掉”。文艺作品的好坏、优劣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好坏、优劣，不是以个人的意志、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爱心、好恶为转移的。讲审查，我们就要提倡党内行加群议，要实行评议、评奖的办法。

围绕着诗歌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个中心问题，座谈会回顾了新诗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探讨了诗歌创作的发展。大家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是有成绩的，五、四以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新诗都有过大大发展。“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是

围绕着诗歌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个中心问题，座谈会回顾了新诗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探讨了诗歌创作的发展。大家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是有成绩的，五、四以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新诗都有过大大发展。“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是

围绕着诗歌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个中心问题，座谈会回顾了新诗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探讨了诗歌创作的发展。大家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是有成绩的，五、四以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新诗都有过大大发展。“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是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北京市一批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

本报讯 北京市各部门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对错划右派进行改正的指示。经过复查，到春节前，全市已有二千五百三十一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了改正。其中，原市委、区、局级领导干部和知名的教授、副教授王斐然、贺生高、罗青、钱端升、向达、陈达、薛愚、金宝善、孟昭英、王重民、王振铎、张岱年、孙念慈、刘思齐、于振骅、张天麟、林传鼎、沈启无等三十五位同志都已得到改正。党的政策的落实，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对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中共北京市委在切实贯彻执行中央有关指示的同时，结合本市情况，对改正和安置工作作了一些具体规定。许多单位以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准则，参照市委的具体规定，依靠本单位的复审人员和群众进行讨论分析，分清大是大非，凡属错划的，坚决改正；凡应该安置的，妥善安置。北京大学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抓得较紧，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发动群众搞复查。北大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划右派分子七百一十五名，还有未戴右派帽子受各种处分的人八百四十二名，需要复审的面相当大，光靠少数人关门搞专案是不行的。他们采取层层发动的办法，从校党委、系总支到党支部和每个党员，都发动起来，大家畅所欲言，提出审查意见。他们采取先易后难的

办法，抓住集团性问题，解决一个，改正一批人的问题。同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受审人员和所有同志都能深刻分析中央文件精神，对当时定案情况理解有个准绳，做到既积极又慎重，坚持实事求是。法院院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把九名右派分子开除、强迫退职退休、遣送回乡。这些年来，他们虽然不断申诉，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中央文件下达以后，院党委从去年九月初开始，对这些人的改正、安置问题多次研究，并迅速派人到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给他们认真落实政策。在当院党委协助下，给这九位同志恢复了公职，并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作了

坚持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上海市抓紧做好错划右派改正工作

本报讯 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革委会各部门以及各区、县、党委，在做好对右派分子摘帽和安置工作的同时，亲自抓了一些有影响的案件，做好被错划为右派的人的审改工作。到春节前，全市已有四千一百七十二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了改正。其中有局以上干部二十四人，处级干部八十多人。经过改正的同志，都表示要在今后尽最大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许多部门从审改工作复议情况中看到，当时所以有许多同志被错划为右派，是有许多历史教训可以吸取的。有的把对市委领导人和对本单位领导人员提出的批评，说成是“反党市委领导”、“攻击党的领导”；有的把对执行政策中的问题的批评，说成是“否定党的政治运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有的把执行上级指示，说成是“煽风点火”，“发动右派向党进攻”、“污蔑党的领导”；有的把正常的工作或工作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的把思想工作风上的一般缺点错误，和在学讨论中说的一

写的题为《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一文，论述了关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剩余劳动、关于社会主义利润和社会主义积累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这一期的《学术月刊》还刊载了郭思贤等理论工作者写的理论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题下发表了经济学工作者和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撰写的一组笔谈。

葛《纳西族史诗《创世记》拉族史诗《牡帕密帕》：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和生产斗争的叙事长诗歌尼人（彝族）的《阿诗玛》、纳西族的《玉龙第三国》、傣族的《一百零一朵花》、《召树屯》、《松帕敏和嘎西娜》、《三只鹦鹉》、《细挂》、《葫芦信》、《彝族》、《苏文纳和地的儿子》、《族抒情长诗《逃到甜蜜的地方》等。

诗歌运动的又一个新发展。对新诗六十年来成绩不能一笔抹煞，从零开始。创造新诗这样的新诗体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抛开了前人在新诗发展中的探索和成绩，我们新诗的发展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新诗要继续发展，当然就要吸收古典诗词和民歌的营养、外国诗歌的营养，但是，新诗六十年的传统和经验，是发展我们今天的新诗的最直接的营养和借鉴。新诗的六十年来出现许多诗人和作品，研究这个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结论：为人民的、为我们国家前途命运而奋斗的人是永存的；同我们人民、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联系的作品是不朽的。

座谈会上的许多发言认为，我们的新诗有讲真话的传统，很多优秀诗篇抒发了诗人的真情实感，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我们的诗歌既要有歌颂，也要有暴露——歌颂我们人民的英雄，暴露我们人民的敌人。这是不能颠倒的。但是，无论是歌颂和暴露，都要讲真话，抒真情。我们当然要以歌颂为主。但是，人民并不需要那种浮泛的、不符合实际的歌颂。因为这种歌颂不但没有力量，而且是有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一定会出现新的英雄，也一定会出现新的斗争。我们的诗人要歌颂新的英雄、新的时代，要排击四化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用投枪和匕首向人民一道披荆斩棘，共同前进。

为了调动诗歌队伍的积极性，发挥诗歌在四个现代化中的战斗作用，座谈会还就诗歌界落实政策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来自各地的诗人列举事实说明，诗歌界还有不少冤案、错案、假案至今仍然没有平反、昭雪，呼吁加快诗歌界落实政策的工作。

出席座谈会的诗人们认为，我们的诗人应该具备一种革命者的风格：要正确地对待自己——对自己的思想要严格要求，对自己的创作要以一种对人民严肃负责的精神精益求精；要正确地对待自己的诗歌同行——互相帮助，互评互议，既不孤傲的互相轻视，也不要庸俗的互相捧场；要正确地对待兄弟文艺部门——和音乐、电影、戏剧、美术界的同行协同合作，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大型作品。诗人们充满激情地表示：我们的诗歌界，我们的文艺界，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为我们四个现代化的共同事业，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共同事业，同心同德地一起去奋斗。

妥善安排。市公安局对错划为右派的民警，做到了一个不漏地全部改正，千方百计找到他们的下落，把改正结论通知到本人。

据市委有关部门介绍说：北京市这项工作与中央一些机关相比，是落后的。因此，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继续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打破条条、框框，坚决落实党的政策，继续抓好这项工作。力求在较短时间内做好这项工作，把地委党委协助下，给这九位同志恢复了公职，并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作了

有错必纠

上海市抓紧做好错划右派改正工作

些学习体会，上纲为“右派言行”；有的把对爱人被划为右派或反党分子不服，向组织提出申诉，说成是“丧失立场”、“包庇”、“支持”右派向党进攻。经过对原来定案材料的分析，以当时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来作衡量，分清了是非，明确了那些是不应划而错划的，凡不应划的都坚决予以改正。

上海市各级党组织在进行复审改正工作时，注意抓主要问题，走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同时，注意做好办案同志和被改正同志的思想工作。对原来的积极分子和领导同志，教育他们提高认识，实事求是，特别是对当时的领导人，要求他们要高姿态，认真按党的政策办事。

对被错划的同志，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教育他们向前看，顾大局，讲团结，不要追究个人责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困难，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尽力帮助他们合理解决。鼓励他们团结起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发工作。

胡仁奎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二日电 北京林业学院原院长、党委常委胡仁奎同志因受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含冤病逝，终年六十五岁。今年一月十二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胡仁奎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叶剑英、邓颖超、程子华、薄一波等同志送了花圈。国务院、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农林部、外贸部、铁道部、国家林业总局、海关总局和北京、天津、上海市、中国林业科学院、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山西省定襄县也送了花圈。

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

人、胡仁奎同志的生前友好姚依林、程子华、吕东、罗青长、李葆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和群众代表五百多人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许多同志向胡仁奎同志的爱人李伦同志及子女表示亲切慰问。

骨灰安放仪式由国家林业总局局长梁启武主持，农林部副部长、国家林业总局局长王川致悼词。悼词说，胡仁奎同志是山西省定襄县人。一九二六年十月加入中国国民党。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利用自己的合法社会地位，大力掩护营救我党同志。在抗日斗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派他打入敌人阵营，党先在重庆、南京等地做地下工作，恢复名誉。

邓小平副总理参观福特汽车公司装配厂

新华社亚特兰大二月一日电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二月一日下午在亚特兰大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汽车装配厂。

邓副总理、黄华外长和蔡泽林主任，在福特汽车公司董事



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二月一日在亚特兰大参观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汽车装配厂。

新华社亚特兰大二月一日电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二月一日下午在亚特兰大向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陵墓献了花圈。

马丁·路德·金于一九六八年遇害。他生前曾为美国黑人争取正义、平等和自由而斗争。

邓副总理向马丁·路德·金的陵墓献花圈

邓副总理和夫人卓琳以及黄华外长等人在马丁·路德·金中心与亚特兰大市市长梅纳德·杰克逊和夫人以及已故者的家属会面并进行了亲切交谈。

杰克逊市长说，马丁·路德·金曾为世界和平工作，并为此献身。邓副总理

长亨利·福特第二、公司总经理菲力普·考德威尔和装配厂经理乔治·比特的陪同下，观看了汽车装配线的整个生产过程。

在参观过程中，正在上班的工人不断向中国客人挥手，表示欢迎。邓副总理一位从事联结车身与底盘的青年工人瓦特·胡特进行了交谈。胡特后来对一些美国人和外国记者说，他们自己能有机会同中国副总理交谈感到很高兴。胡特说：“他真是一位友好的人。我很抱歉当时忘记对他讲些美好的话。”

在装配线的末端，邓副总理看到精制的小轿车一辆接一辆地离开装配线。

这个装配厂约有四千名职工，生产数十种型号的小汽车、重型卡车、推土机和拖拉机。年产量为十八万辆，平均将近每小时生产五十辆。

福特汽车公司

福特汽车公司是美国汽车工业史上资格最老的一家汽车公司。它是一九〇三年由亨利·福特与其他股东合伙创立的。二十世纪初，它是美国和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以后，被通用汽车公司赶上，居第二位。一九七七年，福特汽车公司的汽车年产量是三百七十四万八千辆。

福特汽车公司总厂设在美国密歇根州的迪尔伯恩，在国内设有六十个制造厂和装配厂以及十几个工程科研单位。它在主要生产各种汽车的同时，还兼营钢铁、冶金、玻璃、造纸等企业和飞机、坦克、导弹等军用物资的生产。它现在也是美国第三家最大的工业公司。

的到来表明，中美两国人民在争取和平、繁荣、正义和

互相谅解的斗争中可以看到共同基础。

马丁·路德·金夫人向邓副总理赠送了一张马丁·路德·金的照片和两本有关他的生活和工作的书。她说：“带着这些书，当您回国时就会铭记我们的。我们对您的到来表示感谢。”

方毅副总理参观佐治亚理工学院

新华社亚特兰大二月一日电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下午在这里参观了佐治亚理工学院，看了学院的研究项目中某些重要的部分。这所学院是美国南方最大的理工学

院。在校的广大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方毅副总理是在佐治亚理工学院院长乔治·巴斯基的陪同下到这所学院参观的。学院院长乔治·巴斯基说，方毅副总理在去年秋

天率领一个工程教育代表团访问期间同方毅副总理会晤的情景。方毅副总理听了有关该学院的重要情况的介绍。他还看了说明该学院的地球资源数据

分析系统的幻灯片。这些幻灯片使中国客人能概括地了解该学院的研究人员如何利用这个

电子计算机系统来处理从卫星上获得的数据，利用遥感技术看

到某些特定地区的地面的情况，并向计划人员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以改进对自然资源的利用。

在参观一个太阳能试验装置时，正在从事高级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托马斯·布朗告诉中国客人说，在这个面积为五百

三十二平方米的场地上，共安装了五百五十面镜子，这些镜子能够把太阳光聚集于一个焦

点，从而产生足以把钢板烧穿的高温。

佐治亚理工学院成立于二八八五年。它为学院的一万名学生提供了选修工科专业的广泛的条件。学院十分着重地

和能源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太阳能的研究。这个学院所进行的关于太阳能的多方面研究，在美国是很有名的。

美国新兴工业城市——休斯敦

位于墨西哥湾西北约四十公里处的休斯敦，是美国西部得克萨斯州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第六大城市，人口一百五十万。

休斯敦这个城市是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而兴旺起来的。它本来是一个人口稀少、低洼潮湿的荒原。一九〇一年，休斯敦东北一百二十公里的斯普林城托普地方发现了大油田。随后在联邦政府资助下，扩大、加深了由休斯敦至墨西哥湾的航运运河工程。一九一四年运河工程完成，可以容纳巨型海洋货轮出入，休斯敦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随着得克萨斯州油田的相继发现，许多石油公司都在休斯敦设立了炼油厂。休斯敦逐步发展成为美国石油、石化工业中心，它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石油科研机构和设备。

设在休斯敦地区的许多石油

油化工厂生产两百九十多种有机化学产品和八十多种无机化学产品，它们生产的合成橡胶产量约为全国产量的一半。这是美国的乙烷约为美国全国乙烷产量的三分之一。

休斯敦在空间科学发展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所属空中飞行中心设立在休斯敦南面的“清湖”畔，是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

的三大前沿科学——基本粒子、天体演变和生命起源方面，美国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美国的大专院校是搞基础研究的主要基地，同时也进行应用和技术研究。全国各大学设立的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共五千多个。

另一个特点是，美国大多数私营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也越来越重视科研工作，把科技研究视为竞争和企业生存的生命线。许多大公司都设有专门搞科研的机构和收集情报的系统，招聘大量科技人才，投入巨额经费，通过科技努力提高技术水平，改进和发展产品。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研究所，雇有一万六千名职工，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就有一千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科研机构有二万九千人，它在国内有二十一个研究所，在西欧和日本设有九个研究所，其中的沃森研究所与贝尔研究所并驾齐驱。美国《商业周刊》曾对五百九十八家私营企业进行过调查，它们在一九七六年支出的研究和发展费用达一百六十二亿美元。一九六〇年以后，美国三十多个州陆续建立了科研工作区。把工厂、企业设在有名的科研机构或大学附近，形成一个科研和工业的综合体。现在美国的科研单位正向着综合性科研工作发展，强调综合性成果，以便形成专利技术。

战后，美国在科研和发展事业中投入经费之巨大，活动范围之广，科研机构人员之众多，为世界所瞩目。这些已成为推动美国科技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三年，美国虽然经历了五次经济危机，但工业产值仍然增长了

一点八倍，而在这时期职工人数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成功和广泛应用在美国近代生产发展中

起了十分显著的作用。美国是电子计算机工业最发达、技术最领先的

国家。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一九四五年诞生在费城阿彻迪克之后，技术不断改进。从电子管计算机发展为晶体管计算机，又由集成电路计算机发展为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使美国工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为生产和管理实现高速化、大型化、综合化、自动化创造了条件。例如，在钢铁工业中，采用吹氧转炉炼钢，每一分钟可出一炉钢，但它的反应应迅速和复杂，只有用电子计算机和其它电子装置，才能大大提高冶炼效率和合格率。又如带钢热轧，七十年代初一台年产二百万吨的带钢热轧机，用人工控制每周生产五百吨就是破纪录的成绩。改用电子计算机控制后，每周能生产五万吨，为人工控制生产的一百倍，而且质量显著提高。目前，美国在冶金、电力、石油、化工、机械等部门采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化生产日益增多，并且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除了工业部门以外，美国在农业、商业、服务业等经济部门以及科研和军事部门也大量使用电子计算机。据美国报刊报道，美国现在应用电子计算机的领域已超过三十个。电子计算机设置的累计台数迅速增长，一九五四年全国只有十台，到一九七六年就超过了二万台，其中百分之四十是中大型和大型的。此外还有七十五万台微型电子计算机。有人估计，美国现有电子计算机完成的工作量，需要四万七千名人员来完成，而且有些工作已根本无法完成。

中美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有许多方面仍然是中国可以借鉴和学习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将两国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开辟广阔的前景。一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副总理和卡特总统在华盛顿正式签署的两国科技合作协定，标志着这一新时期已经开始了。

新华社记者 袁先禄 蒋元楷

虎视眈眈的北极熊

这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北极熊虎视眈眈正想吞噬横跨海洋的广大地区。图中的标题是《危机四伏的月球地带——麻烦

波及伊朗以外地区》。感受威胁地区国家的名称，按逆时针方向为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阿曼、南也门、以色列、埃及、埃塞俄比亚。这期杂志的专题报道——《危机四伏的月球地带》引用了北热津斯基的一段话：“一个由危机构成的弧形地带正在印度洋洋岸展开。在一个与我们利害攸关的地区，一些脆弱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面临崩溃的危险。很可能被敌视我们的价值、同情我们的敌手的那些因素所填补。”

在发表这篇专题报道的同时，《时代》周刊还发表了《基辛格访问记》，指出“缓和不应该是一种镇静剂”，“美国必须作出无情的估计”。

图为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美国是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较早的国家。美国的科学家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生产技术日新月异的状况下，美国政府更加重视科研工作，采取了有力措施，鼓励科学发明，并把科研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使美国在科研领域和生产领域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战后以来，美国在许多重要部门的科研工作中取得了突破，如原子能利用、集成电路、激光、电子计算机、合成原料、电子通讯、卫星、宇宙空间等，在此基础上大大推动了整个工业的发展。据统计，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技术革新有百分之六十六是美国首先研究成功，有百分之七十五是首先在美国得到应用的。

在科学研究问题上，美国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虽然早在一八八三年美国就建立了国家科学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了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但是，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政府用于研究发展的经费还是比较有限的。一九四一年，全国用于科研的资金只有九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八十来自私营企业和大专院校。当时美国工业生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靠欧洲国家的先进生产技

术。二次大战期间，美国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基础科学研究对国防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当时在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下，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一个借助别国的国家的基本科学知识的国家，在新的竞赛中将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一九四六年，杜鲁门政府成立了国家原子能委员会。一九五〇年，美国通过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拨给了基础科学研究基金。一九五七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激起美国对科研工作更大的重视。这一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总统提出的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一个依靠外国输入基础知识的国家的工业发展步伐将会缓慢下来”。这年十月，美

国把原属国防物资动员局的科学问题委员会划分出来，改组为由总统直接领导的科学问题委员会。一九五八年，又通过了发展科学和技术法令。一九六二年，肯尼迪总统提出要在十年内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庞大的探索空间的计划。

自此以后，国家机构成为科研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经费的主要提供者。科学研究的开支急剧增长。五十年代初期约为五十亿美元，一九六〇年上升到一百三十亿美元，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平均每年达二百七十六亿美元，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平均每年超过三百亿美元。一九七七年科研和发展费用达到四百零八亿美元。二次大战以前，美国的科研与发展费用从未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五，即使在一九四八——一九五二年也未超过百分之二。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提高到百分之二以上，在美国联邦预算中，用于研究与发展的经费占百分之十到十四，而西德、英、法等国则只占百分之五左右，按人口平均计算，美国的研究与发展费用相当于法国或西德的三倍。除联邦政府外，地方政府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也大大增长。

随着科研工作的发展，一支更大的科技队伍也逐步建立起来。一九四一年，美国全国从事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只有八万七千人，一九五四年不到二十四万人，而一九六一年增加到四十二万五千人，一九七六年超过了五十四万八千人。

在研究方针上，从战后到七十年代初，美国曾搞过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方针。美国通过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拨给基础科学研究基金，大大加强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在当前基

础研究的三大前沿科学——基本粒子、天体演变和生命起源方面，美国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美国的大专院校是搞基础研究的主要基地，同时也进行应用和技术研究。全国各大学设立的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共五千多个。

另一个特点是，美国大多数私营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也越来越重视科研工作，把科技研究视为竞争和企业生存的生命线。许多大公司都设有专门搞科研的机构和收集情报的系统，招聘大量科技人才，投入巨额经费，通过科技努力提高技术水平，改进和发展产品。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研究所，雇有一万六千名职工，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就有一千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科研机构有二万九千人，它在国内有二十一个研究所，在西欧和日本设有九个研究所，其中的沃森研究所与贝尔研究所并驾齐驱。美国《商业周刊》曾对五百九十八家私营企业进行过调查，它们在一九七六年支出的研究和发展费用达一百六十二亿美元。一九六〇年以后，美国三十多个州陆续建立了科研工作区。把工厂、企业设在有名的科研机构或大学附近，形成一个科研和工业的综合体。现在美国的科研单位正向着综合性科研工作发展，强调综合性成果，以便形成专利技术。

战后，美国在科研和发展事业中投入经费之巨大，活动范围之广，科研机构人员之众多，为世界所瞩目。这些已成为推动美国科技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三年，美国虽然经历了五次经济危机，但工业产值仍然增长了

一点八倍，而在这时期职工人数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成功和广泛应用在美国近代生产发展中

起了十分显著的作用。美国是电子计算机工业最发达、技术最领先的

国家。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一九四五年诞生在费城阿彻迪克之后，技术不断改进。从电子管计算机发展为晶体管计算机，又由集成电路计算机发展为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使美国工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为生产和管理实现高速化、大型化、综合化、自动化创造了条件。例如，在钢铁工业中，采用吹氧转炉炼钢，每一分钟可出一炉钢，但它的反应应迅速和复杂，只有用电子计算机和其它电子装置，才能大大提高冶炼效率和合格率。又如带钢热轧，七十年代初一台年产二百万吨的带钢热轧机，用人工控制每周生产五百吨就是破纪录的成绩。改用电子计算机控制后，每周能生产五万吨，为人工控制生产的一百倍，而且质量显著提高。目前，美国在冶金、电力、石油、化工、机械等部门采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化生产日益增多，并且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除了工业部门以外，美国在农业、商业、服务业等经济部门以及科研和军事部门也大量使用电子计算机。据美国报刊报道，美国现在应用电子计算机的领域已超过三十个。电子计算机设置的累计台数迅速增长，一九五四年全国只有十台，到一九七六年就超过了二万台，其中百分之四十是中大型和大型的。此外还有七十五万台微型电子计算机。有人估计，美国现有电子计算机完成的工作量，需要四万七千名人员来完成，而且有些工作已根本无法完成。

中美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有许多方面仍然是中国可以借鉴和学习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将两国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开辟广阔的前景。一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副总理和卡特总统在华盛顿正式签署的两国科技合作协定，标志着这一新时期已经开始了。

新华社记者 袁先禄 蒋元楷

虎视眈眈的北极熊

这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北极熊虎视眈眈正想吞噬横跨海洋的广大地区。图中的标题是《危机四伏的月球地带——麻烦

波及伊朗以外地区》。感受威胁地区国家的名称，按逆时针方向为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阿曼、南也门、以色列、埃及、埃塞俄比亚。这期杂志的专题报道——《危机四伏的月球地带》引用了北热津斯基的一段话：“一个由危机构成的弧形地带正在印度洋洋岸展开。在一个与我们利害攸关的地区，一些脆弱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面临崩溃的危险。很可能被敌视我们的价值、同情我们的敌手的那些因素所填补。”

在发表这篇专题报道的同时，《时代》周刊还发表了《基辛格访问记》，指出“缓和不应该是一种镇静剂”，“美国必须作出无情的估计”。

图为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美国是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较早的国家。美国的科学家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生产技术日新月异的状况下，美国政府更加重视科研工作，采取了有力措施，鼓励科学发明，并把科研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使美国在科研领域和生产领域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战后以来，美国在许多重要部门的科研工作中取得了突破，如原子能利用、集成电路、激光、电子计算机、合成原料、电子通讯、卫星、宇宙空间等，在此基础上大大推动了整个工业的发展。据统计，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技术革新有百分之六十六是美国首先研究成功，有百分之七十五是首先在美国得到应用的。

在科学研究问题上，美国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虽然早在一八八三年美国就建立了国家科学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了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但是，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政府用于研究发展的经费还是比较有限的。一九四一年，全国用于科研的资金只有九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八十来自私营企业和大专院校。当时美国工业生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靠欧洲国家的先进生产技

术。二次大战期间，美国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基础科学研究对国防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当时在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下，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一个借助别国的国家的基本科学知识的国家，在新的竞赛中将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一九四六年，杜鲁门政府成立了国家原子能委员会。一九五〇年，美国通过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拨给了基础科学研究基金。一九五七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激起美国对科研工作更大的重视。这一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总统提出的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一个依靠外国输入基础知识的国家的工业发展步伐将会缓慢下来”。这年十月，美

国把原属国防物资动员局的科学问题委员会划分出来，改组为由总统直接领导的科学问题委员会。一九五八年，又通过了发展科学和技术法令。一九六二年，肯尼迪总统提出要在十年内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庞大的探索空间的计划。

自此以后，国家机构成为科研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经费的主要提供者。科学研究的开支急剧增长。五十年代初期约为五十亿美元，一九六〇年上升到一百三十亿美元，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平均每年达二百七十六亿美元，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平均每年超过三百亿美元。一九七七年科研和发展费用达到四百零八亿美元。二次大战以前，美国的科研与发展费用从未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五，即使在一九四八——一九五二年也未超过百分之二。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提高到百分之二以上，在美国联邦预算中，用于研究与发展的经费占百分之十到十四，而西德、英、法等国则只占百分之五左右，按人口平均计算，美国的研究与发展费用相当于法国或西德的三倍。除联邦政府外，地方政府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也大大增长。

随着科研工作的发展，一支更大的科技队伍也逐步建立起来。一九四一年，美国全国从事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只有八万七千人，一九五四年不到二十四万人，而一九六一年增加到四十二万五千人，一九七六年超过了五十四万八千人。

在研究方针上，从战后到七十年代初，美国曾搞过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方针。美国通过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拨给基础科学研究基金，大大加强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在当前基

二月一日早晨，邓小平副总理圆满结束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访问活动，乘坐美国总统专机前往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

“五星红旗下第一次在白宫宫殿，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一家美国报纸这样写道。的确，从邓副总理访美以来在华盛顿的见闻，使人们强烈地感到，中美两国关系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这就是：近三十年的两国相互隔绝的状态已经结束，两国人民友好合作的新时期从此开始。邓副总理和卡特总统会谈取得的成功，表明中美两国在全局性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同点。美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对邓副总理的热情接待和盛大欢迎，反映了美国人民加强中美友好关系的殷切期望。

“超级的接待”

几天来，美国报纸报道欢迎邓副总理的情况时，普遍使用了“超级的接待”、“超级的接待”、“盛况空前”、“激动人心”之类的词句。这种描述并不是夸张。

卡特总统一月二十九日在白宮南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标志着邓副总理正式访问的开始。在这次仪式上，出席的美国高级官员和著名人士之齐全，参加采访的各国记者和来自美国各地的记者之众多，以及人们在过程中表现的情绪之热烈，都是美国近代历史上罕见的。一位熟悉首相威尔逊访美差可比拟，无怪乎一些美国报纸把这次欢迎仪式称作是“超级的接待”规格了。

当晚的国宴同样引起美国新闻界的注意。限于白宫宴会厅的容量，出席人数无法扩大。但是，正如报纸所说的，美国政界的重要决策人几乎全部在国宴座上出现了。国宴的安排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为了确定菜单，卡特夫人亲自主持，聘请名厨师进行研究。为了布置宴会厅，卡特总统特地请他故乡佐治亚州一些园艺爱好者在家庭花园里采选一批植物而装饰的山茶花，用专车运送到白宫来。山茶花，根据当地习俗，是喜庆吉祥的象征。当年卡特总统进入白宫时，就曾由佐治亚州采运山茶花布置就职仪式的大厅。这次，在欢迎邓副总理的国宴中，宴会厅的每张桌上均放着一只鲜艳的山茶花，周围点燃着一圈明烛。这种别具一格的布置，表示了美国主人对邓副总理的良好愿望。

在肯尼迪中心举行文艺演出，又是一种破格的安排。通常，美国政府在国宴后接着就在白宫宴会厅或玫瑰园举行小型演出，款待客人。这次，为了使美国各界人士有机会更多地参加欢迎邓副总理的活动，卡特总统决定把文艺演出改在参华的肯尼迪中心举行。对演出的要求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反映丰富多采的美国传统艺术的风采。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演出的组织者作了紧张的准备。参加演出的艺术家，是从全国四个地区邀请来的。这次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几天来华盛顿的一个有口皆碑的佳话。

就在正式访问的第一天，高潮一个接着一个地不断出现。在邓副总理在华盛顿整个访问活动中，情况都是如此。

友好的气氛

中美友好的气氛，几天来在美国以至整个美国是越来越浓了。拿起报纸，从头条到里页登载着大量有关邓副

中美友好的新起点

本报记者 袁先禄 蒋元楷

总理和夫人卓琳的访问以及介绍中国的报道。打开电视，新闻节目的第一条是邓副总理访问的实况。在社交场合，中美友好是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在同美国朋友个别接触时，不少人反复表示对于发展中美友谊的热烈。

在对邓副总理的接待工作中，美国主人们有意地通过各种方式突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情。

从国宴开始，不论是政府举行的宴会还是民间团体举行的宴会，餐谱普遍采用中国式的圆桌。在参院的宴会上，参议员尼奇奇建议全体参加者都用筷子用餐。在肯尼迪中心举行文艺演出和几个招待会上，美国女宾中不少人特地穿着用中国原料制作的服装，有的甚至穿着纯粹中国风格的服装。每一个节目演出前，都专门安排了曾经访问过中国的著名人士报幕，并且对中国进行赞扬。有的演员还特地学几句中国话，向中国客人表示欢迎。这次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是由孩子们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在美国人民友好团体举行的宴会上，每个参加者胸前都佩戴了用中美两国国旗图案组成的“友谊纪念章”。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等团体举行的招待会，则选择了由中国使馆的美国著名建筑师贝聿明设计的建造的美国大使馆东厅作为地址。在卓琳夫人的访问日程中，安排了参观中国人民赠送美国人民的珍贵动物熊的项目。……正如一些美国朋友说的，美国再次出现了“中国热”。

一位美国朋友对出现这种“中国热”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说：“这不是为了表示好客所作的姿态，而是栽植在人们心里的鲜花在开放”。多么形象的比喻，多么美好的语言！

广阔的前景

邓副总理在华盛顿的访问，生动地表明，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发展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在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卡特总统接受了访问中国的邀请，邓副总理代表华国锋总理接受了访问美国的邀请。两国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几项换文和协议，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并同意为互惠常驻新闻记者提供便利。毫无疑问，今后两国政府的合作和人民之间的交往，必将更牢固，更富有建设性，更充满希望。

在邓副总理在华盛顿的整个访问活动中，有一个场面是特别激动人心的。当肯尼迪中心的文艺演出结束时，邓副总理和夫人在卡特总统和夫人陪同下走出舞台。卓琳同志亲切地同卡特总统十一岁的小女儿艾米来握手。邓副总理在同艺术家们一一握手后，慈祥地俯身同表演合唱的孩子们拥抱。这时，在场的很多美国朋友感动得热泪盈眶。事后，很多美国朋友在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心情十分激动。卡特总统在会谈中，蒙代尔副总统在邓副总理的答谢招待会上，都一再提到这次激动人的场面。这种感情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今天，中美两国友好的道路已经打通，两国人民都希望下一代人将

会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向前迈进。当看到邓副总理慈祥地拥抱孩子们而孩子们天真地报以微笑时，人们不能不从内心深处欢呼：让孩子们在中美友好的阳光雨露下成长吧！让中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美国

虎视眈眈的北极熊

这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北极熊虎视眈眈正想吞噬横跨海洋的广大地区。图中的标题是《危机四伏的月球地带——麻烦

波及伊朗以外地区》。感受威胁地区国家的名称，按逆时针方向为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阿曼、南也门、以色列、埃及、埃塞俄比亚。这期杂志的专题报道——《危机四伏的月球地带》引用了北热津斯基的一段话：“一个由危机构成的弧形地带正在印度洋洋岸展开。在一个与我们利害攸关的地区，一些脆弱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面临崩溃的危险。很可能被敌视我们的价值、同情我们的敌手的那些因素所填补。”

在发表这篇专题报道的同时，《时代》周刊还发表了《基辛格访问记》，指出“缓和不应该是一种镇静剂”，“美国必须作出无情的估计”。

图为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美国是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较早的国家。美国的科学家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生产技术日新月异的状况下，美国政府更加重视科研工作，采取了有力措施，鼓励科学发明，并把科研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使美国在科研领域和生产领域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战后以来，美国在许多重要部门的科研工作中取得了突破，如原子能利用、集成电路、激光、电子计算机、合成原料、电子通讯、卫星、宇宙空间等，在此基础上大大推动了整个工业的发展。据统计，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技术革新有百分之六十六是美国首先研究成功，有百分之七十五是首先在美国得到应用的。

在科学研究问题上，美国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虽然早在一八八三年美国就建立了国家科学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了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但是，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政府用于研究发展的经费还是比较有限的。一九四一年，全国用于科研的资金只有九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八十来自私营企业和大专院校。当时美国工业生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靠欧洲国家的先进生产技

术。二次大战期间，美国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基础科学研究对国防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当时在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下，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一个借助别国的国家的基本科学知识的国家，在新的竞赛中将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一九四六年，杜鲁门政府成立了国家原子能委员会。一九五〇年，美国通过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拨给了基础科学研究基金。一九五七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激起美国对科研工作更大的重视。这一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总统提出的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一个依靠外国输入基础知识的国家的工业发展步伐将会缓慢下来”。这年十月，美

国把原属国防物资动员局的科学问题委员会划分出来，改组为由总统直接领导的科学问题委员会。一九五八年，又通过了发展科学和技术法令。一九六二年，肯尼迪总统提出要在十年内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庞大的探索空间的计划。

自此以后，国家机构成为科研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经费的主要提供者。科学研究的开支急剧增长。五十年代初期约为五十亿美元，一九六〇年上升到一百三十亿美元，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平均每年达二百七十六亿美元，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平均每年超过三百亿美元。一九七七年科研和发展费用达到四百零八亿美元。二次大战以前，美国的科研与发展费用从未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五，即使在一九四八——一九五二年也未超过百分之二。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提高到百分之二以上，在美国联邦预算中，用于研究与发展的经费占百分之十到十四，而西德、英、法等国则只占百分之五左右，按人口平均计算，美国的研究与发展费用相当于法国或西德的三倍。除联邦政府外，地方政府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也大大增长。

随着科研工作的发展，一支更大的科技队伍也逐步建立起来。一九四一年，美国全国从事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只有八万七千人，一九五四年不到二十四万人，而一九六一年增加到四十二万五千人，一九七六年超过了五十四万八千人。

在研究方针上，从战后到七十年代初，美国曾搞过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方针。美国通过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拨给基础科学研究基金，大大加强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在当前基

础研究的三大前沿科学——基本粒子、天体演变和生命起源方面，美国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美国的大专院校是搞基础研究的主要基地，同时也进行应用和技术研究。全国各大学设立的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共五千多个。

另一个特点是，美国大多数私营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也越来越重视科研工作，把科技研究视为竞争和企业生存的生命线。许多大公司都设有专门搞科研的机构和收集情报的系统，招聘大量科技人才，投入巨额经费，通过科技努力提高技术水平，改进和发展产品。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研究所，雇有一万六千名职工，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就有一千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科研机构有二万九千人，它在国内有二十一个研究所，在西欧和日本设有九个研究所，其中的沃森研究所与贝尔研究所并驾齐驱。美国《商业周刊》曾对五百九十八家私营企业进行过调查，它们在一九七六年支出的研究和发展费用达一百六十二亿美元。一九六〇年以后，美国三十多个州陆续建立了科研工作区。把工厂、企业设在有名的科研机构或大学附近，形成一个科研和工业的综合体。现在美国的科研单位正向着综合性科研工作发展，强调综合性成果，以便形成专利技术。

战后，美国在科研和发展事业中投入经费之巨大，活动范围之广，科研机构人员之众多，为世界所瞩目。这些已成为推动美国科技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三年，美国虽然经历了五次经济危机，但工业产值仍然增长了

一点八倍，而在这时期职工人数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成功和广泛应用在美国近代生产发展中

起了十分显著的作用。美国是电子计算机工业最发达、技术最领先的

国家。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一九四五年诞生在费城阿彻迪克之后，技术不断改进。从电子管计算机发展为晶体管计算机，又由集成电路计算机发展为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使美国工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为生产和管理实现高速化、大型化、综合化、自动化创造了条件。例如，在钢铁工业中，采用吹氧转炉炼钢，每一分钟可出一炉钢，但它的反应应迅速和复杂，只有用电子计算机和其它电子装置，才能大大提高冶炼效率和合格率。又如带钢热轧，七十年代初一台年产二百万吨的带钢热轧机，用人工控制每周生产五百吨就是破纪录的成绩。改用电子计算机控制后，每周能生产五万吨，为人工控制生产的一百倍，而且质量显著提高。目前，美国在冶金、电力、石油、化工、机械等部门采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化生产日益增多，并且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除了工业部门以外，美国在农业、商业、服务业等经济部门以及科研和军事部门也大量使用电子计算机。据美国报刊报道，美国现在应用电子计算机的领域已超过三十个。电子计算机设置的累计台数迅速增长，一九五四年全国只有十台，到一九七六年就超过了二万台，其中百分之四十是中大型和大型的。此外还有七十五万台微型电子计算机。有人估计，美国现有电子计算机完成的工作量，需要四万七千名人员来完成，而且有些工作已根本无法完成。

中美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有许多方面仍然是中国可以借鉴和学习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将两国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开辟广阔的前景。一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副总理和卡特总统在华盛顿正式签署的两国科技合作协定，标志着这一新时期已经开始了。

新华社记者 袁先禄 蒋元楷

虎视眈眈的北极熊

这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北极熊虎视眈眈正想吞噬横跨海洋的广大地区。图中的标题是《危机四伏的月球地带——麻烦

波及伊朗以外地区》。感受威胁地区国家的名称，按逆时针方向为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阿曼、南也门、以色列、埃及、埃塞俄比亚。这期杂志的专题报道——《危机四伏的月球地带》引用了北热津斯基的一段话：“一个由危机构成的弧形地带正在印度洋洋岸展开。在一个与我们利害攸关的地区，一些脆弱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面临崩溃的危险。很可能被敌视我们的价值、同情我们的敌手的那些因素所填补。”

在发表这篇专题报道的同时，《时代》周刊还发表了《基辛格访问记》，指出“缓和不应该是一种镇静剂”，“美国必须作出无情的估计”。

图为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美国是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较早的国家。美国的科学家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生产技术日新月异的状况下，美国政府更加重视科研工作，采取了有力措施，鼓励科学发明，并把科研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使美国在科研领域和生产领域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战后以来，美国在许多重要部门的科研工作中取得了突破，如原子能利用、集成电路、激光、电子计算机、合成原料、电子通讯、卫星、宇宙空间等，在此基础上大大推动了整个工业的发展。据统计，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技术革新有百分之六十六是美国首先研究成功，有百分之七十五是首先在美国得到应用的。

在科学研究问题上，美国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虽然早在一八八三年美国就建立了国家科学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了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但是，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政府用于研究发展的经费还是比较有限的。一九四一年，全国用于科研的资金只有九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八十来自私营企业和大专院校。当时美国工业生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靠欧洲国家的先进生产技

术。二次大战期间，美国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基础科学研究对国防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当时在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下，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一个借助别国的国家的基本科学知识的国家，在新的竞赛中将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一九四六年，杜鲁门政府成立了国家原子能委员会。一九五〇年，美国通过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拨给了基础科学研究基金。一九五七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激起美国对科研工作更大的重视。这一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总统提出的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一个依靠外国输入基础知识的国家的工业发展步伐将会缓慢下来”。这年十月，美

国把原属国防物资动员局的科学问题委员会划分出来，改组为由总统直接领导的科学问题委员会。一九五八年，又通过了发展科学和技术法令。一九六二年，肯尼迪总统提出要在十年内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庞大的探索空间的计划。

自此以后

